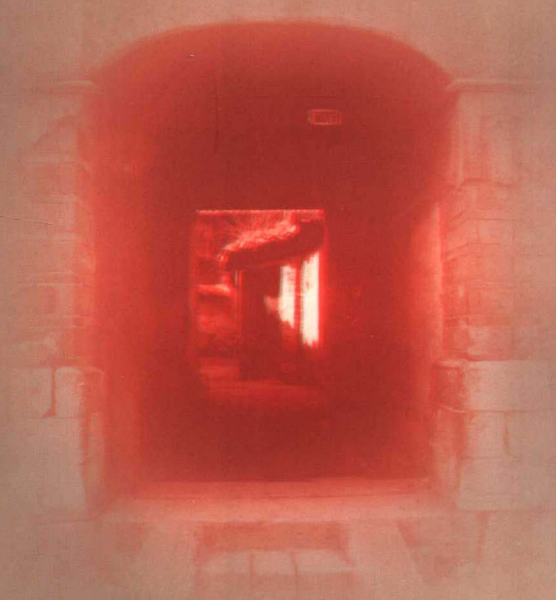


西南联大·昆明记忆 ③

文化与生活



西南联大
四十年
昆明
风貌
写真
文化
剪影

著

者

余

斌

图

片

唐

笙

余

晓

夕

云南民族出版社

西南联大·昆明记忆 ③

文化与生活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著

图 者

片

余 唐 余
晓 云 斌
夕 笙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生活/余斌著;唐云笙,余晓夕图片.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0
(西南联大·昆明记忆③)
ISBN 7-5367-2765-8

I.文... II.①余... ②唐... ③余... III.随笔—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081 号

策 划:李安泰
责任编辑:郑卫东
责任校对:张 哲
装帧设计:李 木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制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25 字数:100 千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定价:45.00 元(全三册) 本册定价:15.00 元

ISBN 7-5367-2765-8/I·622

城市的文化地图

——为余斌先生《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而作

汤世杰

边地云南，“二战”中有两件大事，值得我们永世记取。一是滇西抗战，中国军民以三年多时光和十数万血肉之躯，与日军在怒江隔岸相峙，最终发起反攻，全歼入侵之敌，惨烈悲壮，浩气长存。一件则关乎文化——各地的文人学子，齐聚战时的昆明，群贤毕至，如灿烂群星，辉映边城。他们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传道，授业，思索，研究，写作，创造，养成了一大批学界精英，文化血脉借此得以传承延续，成就了后世难以企及的辉煌。前者为武，后者为文，一文一武，皆可歌可泣，可圈可点，专家、学者，对之考证、研究、阐发者众，至今，仍时有新著问世。

余斌教授关注的是后者，所著《西南联大·昆明记忆》，一题三卷，以著者在昆明历时多年的寻访为线，以40年代居于昆明的文化人散落四方的住处为点，经经纬纬铺撒开去，重现诸多文化人的寓所行止，日常起居，揭示当年昆明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风景，一如20世纪40年代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引我们徜徉其间；眼光，是当代文化研究者的眼光，笔触则温润怀旧。如拊掌闲谈，满眼战时风雨，书生颜色，读来兴味盎然。

昆明是个奇异的移民城市，偏远也实在偏远。当年交通不便，道路滞涩，从北京、天津、上海到昆明，或一路步行，筚路蓝缕，辗转数省，或由经水路，绕道香港，风雨颠簸，都要吃些苦头。然时势所迫，数年间，仍有无数学人聚集于此。幸好当年的昆明，气度足够的大，不仅包容、融合了各种思潮，还让各种思索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这里生长，壮大，开花，结果。一座“西南联大”，因此造就了众多科技、人文精英，至今让人唏嘘感慨。有文章说，在美国某著名大学，出身于“西南联大”的博士、教授和研究人员，占到将近一半的比例。这数字相当惊人，是不是准确，我不好说，但我相信那个大体的估计，并无夸大。而当年的条件，却极简陋，极寒伦。看来所有优秀的文化成果，从来都不出在权位之家，也与豪华别墅、妻妾如云无关。中国知识分子“价格”的低廉与智慧的超人，由此可见一斑。当年那些文化人，既无重点学科经费，也无“专家”补贴，既无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也没有具有起码条件的实验室，躲警报钻地洞是常事，坐趟马车上上班，已属奢侈，却一边著书立说，一边殚精竭虑地思索，一边走访民间探索调查。衣食住行都极为艰苦，庶几只可维持温饱。比如住，那些文化先驱，学界巨擘，并不都住在“联大”校园，倒是见缝插针，散居于昆明僻街陋巷，

有的为避战火，求清静，甚而远遁至今仍属远郊的城市边缘。所谓安定，也非有厅堂楼阁，不过是临时租用的房子，或民宅、农舍，或古寺、旧庙，甚至是自建的简易房屋。据我所知，仅昆明北郊龙头村及附近的棕皮营、麦地村、司家营、落索坡一带，当时就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清华文科研究所等几大研究机构和北平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工作站，租用当地的一些寺庙、祠堂，作为研究场所。在那里住过、工作过的著名人物，据一份不完全的名单所说，就有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政治学家钱端升，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吴晗，语言学家李方桂、王力、罗常培，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光未然，音乐家查阜西、赵讽等等。在昆明的大西门、文林街、青云街一带，如今看上去毫不起眼的一幢民宅，当年也藏龙卧虎，常有风云际会，高人出入。世事沧桑，人去楼空。那些房屋，或历经风雨，朽烂拆除，或遭遇改建，面目全非。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对那些文化人的文化建树，已多有描述与探索，但那些留下过文气墨香的老屋，那批文化人当年的俭朴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究竟怎样过日子、做学问，怎样与当地人士相处等等，却仍少有人去涉及。

余教授乃有心之人，从上世纪90年代起，赶在城市扩建、大举拆迁之前，以闲暇时光，不辞辛苦，走街串巷，远赴郊野，费心费力地四处寻访，每查实一处，便欢呼雀跃，行诸文字，以昭告世人。往往他前脚刚走，拆迁大军便汹涌而至，真让人有失之分秒，便将痛然错失无可挽回之叹。初见余先生那些短文，每每惊讶余先生有那样的雅兴，也叹服余先生有那样老到、简捷与干练，又无处不浸透他温润性情的文字。不久，那批文章陆续见诸报端，编者、读者好评如潮，便是

意料中事了——一个人，凡用心用功做的事，用了几份心，几份功，外人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随后，《云南日报》“文化周刊”记者，多次报道他们如何跟随余先生，前往探访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人在昆明的旧居。足见社会、读者，对余先生的此类写作，有着怎样浓烈的兴趣。那时我想，如果按余先生的文章，将当年众多文化人的住所一一标记在昆明地图上，不就是一幅“二战”时期昆明的文化地图吗？这幅文化地图，奇特、新颖，迄今为止，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还没见过。一座城市，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地图。没有文化地图的城市，是缺乏底蕴的城市。余先生奉献的这幅文化地图，当然是历史绘制的，是当年客居昆明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与昆明民众一起绘制的，用他们的生命、智慧、血性与良知。余先生的功劳，在于他锲而不舍的寻微访幽，辛勤重访，校勘订正，考察标记，才使得这幅战时昆明的文化地图，得以完整如初地奉献给当今的读者。

“礼失而求诸野”。近些年的云南，“文化地理散文”的写作风头正劲，许多作家、学者，不畏岁月湮没，山路迢遥，踏遍山山水水，穷乡僻壤，搜寻探求云南的文化渊源，出版了不下数十部文化地理散文，一时蔚成大观。这些作品，不仅出自一般被称为作家者之手，也出自社会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之手。像余先生这样，专心致志就近在昆明寻访的，却也不多；或有，也止于市井里巷，风土人情，对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化人生活，甚少触及。细细想来，余先生属意此事，前有多年的魂牵梦萦，继有占尽先机的天时地利人和，当是此项工作的最佳人选。

先生自幼长于昆明，青春年华，负笈远行，求学他方：20世纪80年代初，远在塞上，所参与之《当代文艺思潮》，发风气之先，挟雷携电，震荡域内；80年代末回到家乡，作

为学者、教授和文学理论研究专家，于教学研究之余，转而追寻20世纪40年代昆明的文化景观，先生此举，乃出于一个当代学者，对老一代学人不卑不亢、矢志不移精神的缅怀与景仰，下笔尽管温文尔雅，看似闲情，却有真性情流露，有真见解示人。对那批文化人在昆明生活的具体环境，先生尽心尽意的描述，不仅因为他本人就是“老昆明”，可藉此展示他儿时的记忆，倒是有更深一层的动因。恰如法国人文地理学“年鉴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费弗尔在其《大地与人类进化》一书中所说：“地理环境无疑构成了人类活动框架中的重要部分，但是人本身也参与形成这一环境。”地理环境或空间，不只是一种自然的、与人无关的背景或舞台，人类在对某片地理环境做出最初的叙述后，便像烟云一般消散，事实上，它像空气一样渗透、弥漫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们每日每时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任何人，都会受到具体生活环境的影响，文化人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是文人，也是常人，也要吃喝拉撒睡，也有喜怒哀乐。他们能取得学术成果，既因为他们自己的天分，也因为这片土壤的滋养。如此，展示当年他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及其文化，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同样是这片土地，后来的情形，似乎并不怎么好。个中缘由，值得研究。如果读者从本书看到的，不仅是一些史实，还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志向、敬业与辛劳，能给当代人以启示与借鉴，思考我们的教育，该如何改造，我们的文化事业，该如何建设，我们的社会，该如何发展，则幸甚，幸甚。

我所知道的余先生，乃儒雅之士，性情中人，说话做事，亲切平和，从不张扬，他的写作，无论专著、论文，还是随笔、小品，皆独立自主，属于真正的生命性写作，决不人云亦云，也从无吹捧粉饰，倒常于精微雅致之中，深藏智性的

创见，善意的犀利与率性的独到。细品余先生这类文字，几乎从不见形诸于外的“用力”之处，总是娓娓道来，行于当行，止于当止，自有他泊于自然的潇洒。这样的文字，与那些自以为可以横行天下称王称霸者，真乃天上地下。他所述的那些文化人在昆明的经历际遇，不管乖僻怪异，还是中规中矩，也多随缘任运，如水流云在，很少“做意”之痕，甚而剑拔弩张之态。所记者，不管后来只是寻常书生，抑或终成旷世才俊，如今也多如已逝之水，但在余先生笔下，他们的书生意气，学问风格，脾气秉性，一如半个多世纪前边城昆明的江湖旧事，读起来仍滋味深厚，有睛光闪烁，有血丝粘连，有豪气喷洒，带给我们的，是智者思绪的超然飘逸，人生甘苦的深长回味。这样一幅“文化地图”，不是一幅精美却苍白的纸质印刷品，斑斓杂驳，却鲜活跳脱，凸现出的，是那一代文化精英的人格魅力、血性与体温，有着沉沉的分量。一个城市，当然不止一幅文化地图。来日若要为当代昆明绘一幅新的文化地图，余先生已用自己的方式，标明了自己的方位，这就足够了，我想。

2002年12月8日~12日

于昆明北郊

1	城市的文化地图	
	——为余斌先生《西南联大·昆明记忆》而作	汤世杰
1	“二云居士”小考	
6	联大校园的漫画风波	
13	颓唐落魄康白情	
18	吴宓与关麟征	
26	浦江清戏咏 “一去二三里……”	
31	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	
37	最后的闺秀	
43	朱自清昆明遗踪	
51	文化巷十一号	
60	龙头村：冯友兰和他的犹太人邻居	
63	由陈梦家说到闻一多的房东姚家	
67	闻氏兄弟住过周钟岳公馆偏院	

71	挂布分屋两大家
74	探访兴国庵
78	在龙头村的梁思成夫妇
85	寻找“三间房”
93	大西门：藏龙卧虎巷一条
100	百年老街：古旧、苍凉、文化重叠
109	大西门外古驿道
115	当年昆明流行风
121	民歌里的情歌
129	跑警报：不同的记忆
135	联大师生兼差创收种种
143	《未央歌》里的昆明风土风情
158	王力散文的老昆明信息储存
167	南屏大戏院
173	老昆明的外国医生
178	近日楼外“绿纱灯”
185	在昆明寻访名人旧居
192	后 记

“二云居士”小考

刘文典是名教授，在昆明时间又长（1938~1958年），所以有关他的逸闻逸事也特别多，其中流传最广的大概要数“二云居士”的雅号了。

“二云”指云土（云南烟土，即云南鸦片）和云腿，谓刘氏以云南鸦片和云南火腿为嗜好，这雅号传久了大家也就信以为真，然而认真推敲起来，却不免生疑。首先这雅号是自称还是他称？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所见到的文字说法很不一致，像闻一多的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来龙去脉清楚，是历史系郑天挺教授给取的，原创地在蒙自，后来传到昆明，在闻一多主讲的一

(唐云笙提供)

正义路三牌坊。右为威远街，左为光华街。



次讲演会上，经中文系罗庸教授在致词中一介绍，遂成为联大一时之美谈。^①而“二云居士”呢？周作人的说法是：

刘叔雅名文典，……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吃肉，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为“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其所好也。^②

这很明白，是他称，时间为北大迁移昆明之后。

1938年联大毕业的鲲西也说是在来昆之后，但系自称，话很干脆：“刘先生入滇自号二云居士”^③。吴晓铃的说法却有些不同。吴当时是联大中文系助教，他在《忆刘叔雅先生数事》一文中叙及自己初到昆明（吴比一般教师来得晚些），

① 《闻一多年谱长编》第554页。

②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第494页。

③ 鲲西：《清华园感旧录》第12页。



刘文典一见他就问周作人的情况，吴以胡适曾从伦敦寄诗劝周赴昆，周以“家中还有些老小”作推托之语相告。刘文典听后很生气，愤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①听口气像是自称，而且既然都是初到昆明，那雅号好像早在北平时就有了。然而这么讲也有问题。先说鸦片，刘文典早在北平就抽上了，除上面周作人提到外，刘的老同事钱穆亦有文字记述：刘“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救，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②。讲得明白。那么火腿呢？刘文典早在北平就爱吃云南火腿吗？我未见到这方面的文字。那么是到云南（蒙自、昆明）以后才爱吃火腿吗？在云南吃云南火腿没问题，而且抗战初期那几年，昆明物价平稳，教授吃火腿也不算奢侈。再往后可就不好办了。汪曾祺就是从经济条件这一角度提出疑问的。他在《食道旧寻》一文中说到教授生活之艰难：

有一位名教授，外号（引注：既是“外号”，不像自称）“二云居士”，谓其所嗜之物为云土与云腿，我想这不可靠。走进大西门外凤翥街的本地馆子里，一屁股坐下来，毫不犹豫地先叫一盘“金钱片腿”的，只有赶马的马锅头。教授只能看看。唐立庵（兰）先生爱吃干巴菌，这东西是不贵的，但必须有瘦肉、青辣椒同炒，而且过了雨季，鲜干巴菌就没有了，唐先生也不能老吃。沈从文先生经常在米线店就餐。

①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7月，第226页。

不过汪曾祺也是从总体上讲的，而在实际上，许多教授为了生活也都有第二甚至第三职业，在外校兼课，做家庭教师是最普遍的，闻一多挂牌治印（刻图章）更广为人知。刘文典呢更特殊，他与地方上层人士接触多，无论是教家馆还是代人撰寿辞、墓志铭，其“灰色收入”大概非一般教授所能比。钱穆于此亦有较详之记述，说刘文典“曾去某地土司



护国门旧影。为纪念护国起义，1919年建护国门和护国桥。门后（北）为护国路，习称老护国路。（唐云笙提供）

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①。既是“争聘”，可见行情看好，其报

^①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26页。

酬恐亦不止于“最佳鸦片”。还有人讲的更具体，说刘文典“1946年10月，曾代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为蒋介石撰‘六十寿序’”^①。试想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吃点火腿又算得了什么。问题是从此类传闻中只能看出刘文典爱抽大烟上瘾，却看不出他与火腿有什么特别的瓜葛。就此而言，“二云”中只有一“云”可以落到实处，另一“云”却还是虚悬着。

但话又说回来，关于名人的传闻，好些都真伪难辨，只能姑妄听之，太较真就显得迂拙。冯友兰见多识广，撰文述及北大、清华旧事如数家珍，但如非本人亲见亲闻，则抱姑妄听之、姑妄言之的态度，他在转述一则黄侃佚闻之前，先说“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学生中传说着他的佚闻佚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②。确实是这样，大凡名人佚事，好些都像民间文学，被人一遍遍地加工，越传到后越走样，而可读（听）性则越来越强。这或许是个规律罢。

末了再赘上一小节。刘文典在云南生活了二十年，他对滇戏是很喜欢的。汪美珠女士是著名滇戏演员，有一回我向汪女士请教滇戏前辈名角栗成之、碧金玉旧事，她兴致勃勃地讲了不少，顺便也提到云大教授刘文典先生喜欢看滇戏，有时还到剧团看排练，那是五十年代的事了，汪女士说那时她还是学员。走笔至此我忽然想到，如果云腿这一“云”不能落实，滇戏这一云南戏曲也是一“云”，补上去，刘文典先生的“二云居士”雅号也还照样完整。

① 黄延复：《清华逸事》，辽海出版社，1998年9月，第37页。

② 《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6月，第274页。

联大校园的漫画风波

吴晓铃是古典文学研究家，一般人都知道，他在戏曲方面的研究成果，如他参与编订的《关汉卿戏曲集》，他作过校勘、标点和注释的《西厢记》、《六十种曲》等，在学术界都很受推崇。后来，我知道吴晓铃还是一位出色的业余漫画家，他的漫画作品在西南联大还引起过一场风波。

吴晓铃是辽宁人，1937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助教）。联大前期，学生的团体生活比较活跃，也丰富多彩，其中有个团体叫“群社”，是以早先由长沙步行到昆明的“旅行团”为基础而形成的，据说群社最盛时